

郁南文史

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1985.2.15出版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郁南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前 言	政协文史组
史志	郁南县建制沿革……………郁南县档案馆（1）
知识	《西宁县志史话》……………林锦涛（2）
历史	西宁县第一任知县朱宽……………古成新整理（6）
人物	李光汉先生二、三事……………李希文（8）
商会 话旧	民国以来的郁南商会……………郁南工商联编写组（12）
财税 史话	解放前田赋简述……………金时珍（22）
地方	庞寨荔枝今昔……………周文焯 陈其猷（25）
物产	都城著名特产——蜜枣……………孔宪樟（27）
政治	我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回忆……………王仁才（31）
风云	李济深将军到通门……………岑 彪（38）
出土 文物	在我县出土的南明铁炮……………张富文（42）
文化 掠影	郁南解放前文化拾零……………陈良佳搜集记录（45） 征稿启事……………政协文史组（48）

郁南县建制沿革

郁南县在周代属百越。秦代属南海郡。汉刘彻(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平定南越，设交州，下辖苍梧郡，管辖端溪等十一个县，当时郁南是端溪县的一部份。晋代末年，从端溪县划出一部份地方置都城，晋化县，归广州晋康郡管辖，这个都城县即郁南县最早的前身。隋开皇十二年(公元五九二年)将晋化威城二县并入都城县仍隶晋康郡。唐朝贞观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晋康郡更名康州，隶属广州都督府。五代南汉属康州。宋开宝五年(公元九七二年)将都城并入端溪县，隶属广南东路德庆府。元朝属德庆路，隶属江西行中书省。明朝降德庆路为州，隶属肇庆府。

明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以泮水县的东部(罗旁山以东)地区建置东安县(今云浮)，西部地区(罗旁山以西)建置西宁县(今郁南)，将后划德庆、信宜县一部份地方归西宁县管辖；并设置罗定州(今罗定县)管辖两县行政，直接隶属广东布政司。清代初年，沿明代旧制不变，隶属广肇罗道的罗定州。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将原划自信宜的定康四都，还隶信宜县。辛亥革命后，府州制撤销，属广东都督府。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六月，复行道制，属粤海道。同年一月因与青海省西宁县同名而改称郁南县，因其地在郁水(古代西江之名)之南，故名郁南。自西宁县建县至解放初期，县城设在建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建城解放。在一九五〇年建政，县城迁到都城镇。解放后，初属西江专署，后属粤中行署、高要专署，一九五八年十一

月郁南县与罗定县合并，称罗南县（后改罗定县）属江门专区。一九六一年十月恢复郁南县建制。一九六一年江门专区撤销，改隶肇庆专区，现属肇庆地区。解放后的县界略有变更，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加益区（即七区）、一九五八年十月替演区（即六区）的六个乡先后划归罗定县管辖。云浮县的宋桂、东坝两公社一九六〇年划归罗定县，一九六一年恢复郁南县建制时归郁南县管辖。还有南江东面的西江林场及上台、下咀、河朗和森约四个大队原属云浮县的，一九五八年划归郁南县，成立南江口人民公社。

（摘自一九八三年六月郁南县档案馆《郁南县建制沿革》，个别文字有更动）

《西宁县志》史话

林 锦 涛

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桂站总纂《旧西宁县志》记载：自明朝万历五年（1577年）建置西宁县治以来至1936年，历代编修的县志有六次，辑成志书六部。续加桂志，则共为七次，七部。依次列为：

明	万历二十年	（1592年）	林致礼修
清	康熙七年	（1668年）	赵震阳修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王 钺修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张 溶修
	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李玉钹宏修
	道光九年	（1829年）	诸豫宗修
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	桂 站修

时至今日，即自建置西宁县治起至今1984年止凡407年中，共编修县志七次，志书七部。我县档案馆现存有县志两部：一部是明万历二十年的林志影印本。原本存北京图书馆，根据县政协委员张富文提供的线索，今年八月我县请北京图书馆代为复制。另一部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桂志铅印线装本。其余五部均告散佚。

根据林志记载：秦代，罗旁旧属南海郡地。元朝洪武元年（1368年）罗旁是洴水属地。那时，罗旁一带多为瑶、壮族人民所聚居。明朝正统十年（1446年）当地民族矛盾日深，时有争斗。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总督军门殷正茂借口平定瑶乱，报请明廷派大军二十万进行镇压，“剿平之后，靡有孑遗”。翌年，改洴水县为罗定直隶州。由洴水口界分东西两山，东设东安县（即今之云浮）、西设西宁县（今之郁南），即一州两县。相传“罗定”的命名是“罗旁瑶乱已平定”之意。《罗定志·记事》中记载“罗旁界东西二山，延袤七百里，东接新兴，南连阳春，西抵郁林、岑溪，北尽长江（西江），万山联络，瑶壮盘据其中”。据此，当时罗旁地域虽包括今日的罗旁，但比今日的罗旁广大得多。据黄炜浩《罗定历史沿革与居民人口变迁新析》一文考证（一九八三年《罗定文史资料》第三辑），“罗旁的界线大抵也就是罗定直隶州当时的大致界线范围”。

西宁县治的疆域范围，林志有如下记载：“西宁县东西广一百二十里，南北袤五百五十里。东至东安县南江口北岸界二十里；西至广西苍梧县界一百二十里，岑溪县界一百里；南至罗定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德庆州北岸界三十里。又自本县起……抵连滩止一百余里”。西宁第一任知县朱宽是明万历五年莅任的。朱到任后，始建县城、县署、文庙、公馆，并

在封门（今之通门、函口（待查）分设两个守御千户所（兵营），以翼护西宁。林志前序中说：“矧西宁新造草昧而记载缺然，使吏兹土者入其境，风土谣俗不及知”，续而指出今置县十几年，境况大异，“百志成纂修备矣”。以上可见西宁县治是明朝万历五年所建制，首任知县是朱宽，在此之前未见修志，林志即为我县第一部县志，至今已有 392 年之久。

第二至第六部县志，即赵志、王志、张志、李志，诸志，至今下落不明。

第七部县志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桂志。它记述了自清朝道光九年（1829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其间包括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个皇朝共82年的史料。这个时期是帝国主义恣肆侵略中国，妄图把我国变为殖民地过程，同时又是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艰苦斗争过程。此中重大历史事件有鸦片战争（1840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5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中法战争（1889年）、中日战争（1894年）、戊戌政变（1898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0年）以及辛亥武昌起义（1911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动乱时代，这是当时长达82年未能续修县志的一个客观原因。及至1914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三年，西宁县易名为郁南县，邑人以百年“文献湮坠”为由，始有续修县志之议。邑人张炳瑚专司编纂事宜，花了三年功夫搜集史料，事将成，无奈“己未（1917年）民军据邑局捣乱，藏书及修纂底册俱烬”，终成泡影。一晃又过了十多年，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始由桂站总纂，邑人黄翰元、张炳瑚、刘梓材、王克猷、吴公毅（兼总采访）分纂，历时五年，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才编成《旧西宁

县志》。书成，延请当时莅县巡视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第三师师长兼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作了序。从清道光九年（1829年）诸志问世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桂志辑成，其间经历了一百〇八年，才完成一部县志的续修，真使人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桂志虽在民国期间编纂，但序言中申明此次修志“断自道光九年以迄宣统三年”，即是说民国元年以来的史料，俱未撰入。其编纂意图是很明显的，主要的是采集和整理自道光九至宣统三年本县各方面史料，记叙当时现状。

如上所述，从修志事说，我县县志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桂志公诸于世以来，迄今（1984年）已有四十七年未曾续修。如以史料而论，则本县自民国元年（1912年）至今（1984年）长达七十二年的史料（其间包括民国三十八年和解放后三十五年两个阶段）尚有待于搜集和整理。

当代修志，后世写史，自古已然。写史主要是记述过去，修志虽也要追溯过去，但以记述现状为主。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县志全面地记载了历代建制沿革，自然地理（天象、气候、山川、形胜）以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等等，它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因而是一种地方性、历史性、资料性的“百科全书”，被称为“一方的全书”。它不仅可以教育世人，而且惠及后代。前人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为我们提供社会各方面历史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和把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及其特点，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历史借鉴作用。历代保存下来的县志，实是我们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传统，近来，我县响应上级党和

政府的号召，正着手筹备建立修志机构，在不久的将来，定然有社会主义新县志问世了吧。

第一任知县朱宽
西宁县

郁南县旧称西宁县。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因与青海省的西宁县同名而改称郁南县。

根据明朝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林致礼纂修的《西宁县志》记载，西宁县是明朝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开始设置县治的，距今已有四〇七年了。那时的“西宁县东西广一百二十里，南北袤五百五十里。东至东安（基本上即今之云浮）县南江口北岸界六十里，西至广西苍梧县界一百二十里，岑溪县界二百里，南至罗定州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德庆州北岸界三十里。续又奉文改阔新路自旧封门起抵夜护、旧函口抵怀乡（似在今信宜县怀乡区）巡司止计程二百八十余里，又自本县起下城垌逍遥抵连滩止一百余里”。

设县的那年，第一任知县（县长）朱宽上任。他是广西桂林人，举人出身，来西宁以前曾在三水县做知县，因为上级“廉其有治”，调他到西宁这个新设置的县份做知县。

朱宽到了西宁以后，举凡“筑城度地、分田制里、斩荆棘、驱狐狸，皆其身所经历”，“且政宽和，抚招新附”，“经划无巨细皆宽之力”。可以说是“创始元功”。

朱宽到任后，先后主持建筑城池、县署、学署、文庙各一，守御千户所二，公馆三。

据记载：县城墙筑高连雉堞一丈九尺，厚一丈，周围三百八十丈。东南环以壕塘，有东、南、西三个城门，北以近山湮焉各建层楼。东门还有月城一座，周围五丈五尺。另外，还有窝铺二十二间，雉堞八百四十七个，兵马司六拐角楼三，北樵楼一。

县署正堂一座三间，设有赞政厅、仪仗库、主簿衙、县丞衙、典史衙、狱房、卷房、厢房、土地祠、鼓楼等。

守御千户所分设于封门（位于西宁县西北七十里，似在今本县通门区）、函口（位于封门守御千户所南一百二十里，似在今信宜县贵子岭附近——待查）两地。

封门守御千户所筑城周围三百一十九丈，窝铺一十七间，城垛五百一十个，东南楼一座，敌楼四座。有正堂、大门、寝堂、走廊、仪门等。

函口守御千户所筑城周围三百八十丈六尺，角楼窝铺二十六间，城垛六百个，层楼四座，东、南、西三个城门。

三个公馆分别设于罗旁水口、车教、大伞，规模不详。

朱宽还“经划规制、料理支费”建学署、文庙，规模高二丈三尺五寸，深三丈二尺，东西十六丈二尺，计有文庙、仪门、棂星门、名宦祠、乡贤祠、圣公祠、五箴亭、儒学门、明伦堂、掌教衙、分教衙等。此项建设尚未竣工，朱宽病死，由下任知县续完。

由于朱宽在西宁做知县肯卖力干，得到上峰的赏识，曾举荐提拔他去别地做地方官，但是他没有去上任。后来，因水土不服而病死在西宁任上，时间大约是明朝万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秋季。朱的妻子因为丈夫死在异乡，悲伤过度，痛哭而至陨绝身亡。朱的儿子，才九岁，在扶朱宽的灵柩回到乡下以后不久死去。后人向西宁县民间起朱的事绩，

凡是了解他的“无不扼掌称叹”。

朱宽死后，由广西临桂举人郭良楫接任知县，同年冬，基本完成西宁县治的基本建设项目。

明朝万历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朱宽的事迹向上呈报后，得到批准入祀西宁名宦祠。

（古成新整理）

李光汉先生二、三事

李希文

李光汉先生字炳良，郁南县桂圩乡石龙岗村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卒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是广东西江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停顿地前进，经历险阻，直至“毁家纾难”为西江“三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李光汉先生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他年青时代信奉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及其救国的主张。他抱着为国御侮图强的愿望，投笔从戎，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参加粤军系统第四军李济深统率的郑仁祺第三师工作，曾当工兵营营长及西江善后督办处驻三水马房专员。一九二九年间，李济深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后，李光汉对蒋介石不择手段，蓄意陷害，排除异己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深感时政黑暗，世道不平，于一九三〇年愤然解甲回乡。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丧权辱国，致使国土沦陷遭殃，更激起了李光汉

的义愤。李光汉先生是坚决拥护抗日的，他对当时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战斗，极为赞扬，广作宣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广东省党组织派出大批党员深入农村。从此，郁南建立了党组织，领导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当时，李光汉先生是国民党郁南县的参议员，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并为此奔走呼号。他对当时我县建立起来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抗先队”十分同情，并支持“抗先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进行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逆流、到处镇压进步力量的紧急关头，党组织推动作为县参议员的李光汉、谢桂生、莫伯贤、卢鉴明等起来和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及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使反动派不能为所欲为，同时也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使一部份需要撤退隐蔽的进步青年，顺利地转移到桂河的乡保小学校的阵地上，从而掌握了桂河一带的局势。一九四二年，由于党组织的策划和支持，在郁南县参议会的选举中，李光汉先生当上了郁南县参议长，成为郁南政界的风云人物。这就有利于限制地方反动力量，有利于今后的民主革命斗争。当时中共粤北省委受到严重的破坏，转移到郁南隐蔽，就是利用郁南这样比较有利的形势的。在郁南隐蔽下来的人中，有张华、李殷丹、欧新、黎百松、王炎光等。

一九四四年秋，日本侵略军进犯西江。李光汉响应党组织坚决武装抗日的主张，在党组织的策划和组织下，由李光汉出面，向原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借武器（李光汉与邓龙光、李汉魂同事于粤军第三师，交情甚厚），成立“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及所属武装队伍，以抗击日

本侵略军和打击地方汉奸力量，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利益。当时，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李济深正在搞“西南独立运动。”广东省委派李嘉人同志来罗定、郁南，传达党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指示：南方的同志要支持李济深、蔡廷锴在华南“抗日、反蒋、讨汪”另树一帜的主张，要在政治、军事上支持李、蔡的抗日民主运动。“三罗”党组织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员李镇靖、李荣欣等向李光汉先生宣传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李光汉十分赞成。一九四五年春，李济深到了罗定。李光汉曾偕同李镇靖亲自到罗定会见李济深，并迎接他到郁南。在中共党的布置下，以“郁南民众武力指挥部”的名义在通门召开了一个群众欢迎大会。李济深十分感动，在会上热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称赞郁南人民是真正抗日的。以后，郁南人民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闲居在苍梧大坡山的李济深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可见李光汉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抗日反蒋的政治态度是很明确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有贡献的。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恢复其在西江地区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新一军、十三军直压郁南县境，地方反动势力猖獗，开始镇压革命力量。原“郁南民众武力指挥部”指挥官李振业等先后被捕。在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李光汉先生还为营救被捕者而奔走呼号，直至被捕者释放出狱。这时，局势越来越恶化，李光汉先生才按照中共“三罗”工委的意见，进行暂时掩蔽，辗转于江门、广州、澳门之间。直到一九四六年“双十”协定后，局面稍定，他再又回到郁南。

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罗”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并酝酿大起义。其时，李光汉先生又部

署他的幼子李荣开借机取得了国民党郁南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李荣开是黄埔军校十七期毕业生），掌握这部分武装。一九四八年春，中共党组织决定全县起义，指示全体党员，把凡能掌握的武装都集中起来。经过党组织成员吴桐、李荣欣等人动员，李光汉先生慨然赞同起义。他亲笔写字令其子李荣开把县自卫大队武装拉返桂河乡集中，并将存放家中的步枪共二十多枝，子弹三千多发交给起义部队使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都城人民武装起义成功。李光汉先生为这次“四、一八”起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抄了他的家，拆毁了他的房屋，还悬赏花红通令缉捕他。此后，他随军一个时期，后由“三罗”工委委托云浮地方党组织负责掩蔽，李光汉从此即辗转在罗定、云浮、阳春边界上。在这些日子里，他饱尝艰苦，又受到疾病折磨，但对革命前途，却始终是乐观的。在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司令员吴有恒同志来往书信中，李光汉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为国纾难尽毁家，儿孙子媳各天涯，个人生死浑闲事，只要成功蒋匪垮”。这充分表达了李光汉先生毁家参加党领导下武装起义的鲜明立场，对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是至死不渝的，在为人民解放斗争中是坚决站在人民一边的。这也说明了李光汉先生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从个人民主主义思想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一九四九年十月，罗定解放，李光汉得讯后，极为兴奋，无限感慨。在进罗定城途中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六十。由于李光汉先生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三罗”党组织和粤中纵队第四支队部特为他举行追悼会，并将他遗骸安葬于都城飞凤山。

民国以来的都城商会

郁南县工商联史料编写组

清代光绪（一八七五年至一九〇八年）时期，都城圩镇已略具规模，成为西江上游的一个商业集镇。既有本县人开设的店舖，也有外地人经营的商号，业务上互相竞争，彼此利害冲突，宗派性的封建势力由此滋长。其后逐步仿效各大城市，先后按行业或同乡关系，设立堂会，并订立行规公约，以维护各行各派商业经营的利益。

于是先有新会人设立的“敬善堂”（设在现中山路地段），后来改为“区州会馆”。顺德人也设立了“龙江”会馆。东莞人则设立“同益堂”，后改为“东莞会馆”。经营杂货行业的成立“叶公堂”（地址在现新生路七十六号原县工商联会址）。经营谷米行业的也设立了“公平堂”，设置刻有“公平堂”牌号的公秤，供买卖双方衡器方面发生纠纷时使用，以示公平交易。经营板木、柴炭、日杂、山货的行业，设立了“辅仁堂”（会址设在现新生路）。这类组织代表各行业或同乡商人利益，它又是一个集体仲裁机构，调解商业往来所发生的业务和债权债务等纠纷。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民国后，都城商业市场，也日趋兴起，与外地商务往来，日益繁杂，各种瓜葛纠纷，在所难免。不少较大的商户，感到当时现行狭隘性的行会组织和“各扫门前雪”的做法，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便仿效其他商埠，组织商会，作为代表各行各业商人共同利益的统一组织，并作为最高仲裁机构，调协内部关系，处理在商场上出现的纠纷。这

时都城仅有前店后厂的手工业作坊，还未有机械工业，故定名为“都城商会”。民国初年，酝酿成熟后，由各行各业的商人，推举洒米杂货榨油业元丰泰商店的李瑞田（新会人）为首届商会会长，聘请张玉奎（德庆县人）为师爷，并设有文书、杂役和炊事员。办公地址暂借用“敬善堂”（即“冈州会馆”在现中山路）作为临时办公地址。由于首届商会是处在初创时期，又是在封建的行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忙于商业发展和调解商务纠纷，未能注意到商场上必要的基本建设。

一九一四年，第一届商会会长任期已满，各商号推选黄和生平码行的黄伟兴（郁南人）为第二届会长，仍聘请张玉奎为师爷。这届商会向各商号筹集资金，购买了叶姓人的“叶公堂”这座房屋（原工商联会址，现新生路七十六号），作为都城商会的办公地址。这届商会还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当时，省、港、澳、梧经过都城的轮渡，均没有直接泊岸，载卸客、货只是用小艇来回接运。而都城商业日盛，客、货往来与日俱增，如果没有固定的大吨位的驳船，极感不便。因此商会就在鸭仔码头（即现邮电局河堤营业部门口）设置驳艇，订立客、货收费价目，接运商品和旅客上下船，每年将驳艇公开投标承办经营，将收益款项，作为商会办公费和船艇保养费用的开支。

（二）举办公益月会。由各商号自由认做会份，总份数为4,800份，每月每份供会金为白银一两。每月标执400份，在一年十二个月内执领完毕。由第一个月初开始，商会把商号的认份会金收集。各商号按月按自认会份，在月尾投标执会，以出利息高者得标（各会份每份金额为一两，如以收回为0.97两的投标执会，即等于自原付出月息三厘，每次执会

的利息高低没有固定，视当时商场流转资金的宽紧而定）。已执会的商号，每月则按原份值一两的金额交会，未得执会的商号，则按各该月份执会者的投标金额交会份，到年底十二月还未得标会份的，每份全年可收回会金银元十二两，使供会、执会各有好处。商会作为会首，不仅调节平衡商场金融筹码的灵活周转，也有利息的收益，作为会费的开支，故名为公益月费。

（三）举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由于商场日旺，每逢圩期，停泊码头船艇极多，对市民到码头挑水食用带来不便，加上垃圾杂物丢入河内，河水受到污染，很不卫生。因此商会在每个码头设置水筏，筏中央开一个井口，方便市民能挑到较为清洁的食水；还雇请专人管理，在河水涨退期间，把水筏停泊处理妥善，清洗因水涨带来的码头积坭杂物。

（四）举办“公善堂”（即公医院）和“方便所”。

“公善堂”对贫苦市民赠医施药。对病重垂危、无处栖宿的孤寡外地人，则安置于“方便所”收容，或给死者寄放棺柩，方便其亲属到来殓葬（该所设在新圩尾）。“公善堂”设在现中山路207号，后来改为公医院。在迁拆马路时，考虑公医院设在商业中心不大适宜，遂迁到现建设路41号。原有的院址，改作商店出租，以帮补经费的不足。由于开支日多，入不敷出，因而要向各商户发动募捐，并另设董事会，主持院务。由各商号投票推选，聘用当地较有名望的、又乐意为群众服务的中医三名担任公医院医生，由商会付酬劳。医生轮流值月，每天上午在院内免费为市民赠医并对贫苦者进行施药。

（五）郁南地处粤桂边陲，当时地方不安宁，附近农村常被盗匪打家劫舍，为了维护商场治安，商会发动各商户，

在各街道的路口建设闸门，晚上派出更伕值勤巡逻。每年冬季，成立商民冬防自卫团，团员由商号的投资人或其亲属充当。其任务是：协助当地治安机关维持治安，以防备混入市内的盗匪劫掠。商民自卫团团长是“建安平码行”的股东胡老七（胡超常）担任，团部设在当时的华帝庙（现都城镇府所在地）。

这时商会的组织是有章程的，由于年深日久，已无法找到。据老一辈的工商界人士回忆，商会的会长是每届任期三年，连选得连任。

一九一七年第三届商会会长，由各商号推选出广德当铺的邓眉山（三水人）继任，聘请谢学洲（郁南人）为师爷。这个时期，商会既有固定的地址办公，经费也较充裕，它不仅发挥商会的固有职能，而且在原有基础上，也把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办得较好些。

这个时期，都城商业日趋繁盛，已有广州至都城的轮渡行走。轮渡在三八码头湾泊（现大码头）每月交纳停泊费用白银拾圆作为驳艇费的收入。设在鸭仔码头的驳艇，仍照旧接驳运输。

一九二〇年第四届商会会长、师爷仍由第三届的邓眉山、谢学洲连任。

一九二三年第五届商会会长，由各商号推选出大生谷米行的苏少怀（高要县人）担任，聘请黄丽涵（封川县人）为师爷。

这个时期，粤桂军阀混战，桂军沈鸿英部战败，率领其残部从广州、肇庆败退梧州，途经都城时，巧立名目，以筹借军饷为名，向都城商会勒索白银一万元，限期一天交缴，声言若军士无饷开饭，发生意外抢掠，他们概不负责任。当

时会长苏少怀派师爷黄丽涵向他们请求核减和延交，但不获许。苏少怀惧于淫威，胆颤心惊，生怕这事处理不好，不但都城各商号遭殃，其本人生命也会难保。于是连夜找到上届会长邓眉山寻求解决办法。两人联合出动，与黄和生行的黄秀山、建安行的胡超常、合成恒行的梁植元、盛安行的陈仁卿、荣生行的邓锐卿、东成杂货店的朱镜川、祥和当铺的冯芝藩、广祥缸瓦店的容作民、谦泰布匹店的李仲怡等人共同商量、筹集款项应急。先向大户筹集，不足部份由商会在原有的经费项下抽出补足，如期缴交，才避免了一场难以估计的大祸。这届商会处在两广军阀混战时期，商会遭受巨大压力，商户也遭受损失，这时无人愿做会长，苏少怀曾经中途提出辞职，但是无人愿接，只好拖到期满，才进行改选。

一九二六年，第六届会长是和吕牛皮铺的郭侶乔（新会人），师爷是朱义堂（郁南人）。这时是处于粤、桂、湘三省联合北伐战争时期，都城社会暂处于稳定阶段，商业也较为兴盛。

一九二九年第七届会长是合成恒平码行的梁植元（郁南县人）。仍聘请朱义堂为师爷。由于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广东有偏安而治的态势，社会稍趋安定，又逢丰年，这时，广东称为“陈济棠时代”，当时的商人称它是“商业的黄金时期”。广东守备军严博球团驻防都城，要把山顶的牛圩场建为兵房，要商会把场地转移。这时牲牛的上市量日增，也感到原有的圩场不足，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遂将牲牛市场迁往牛圩坦的地方（现飞凤路尾大桥左右），至今人们还称山顶为兵房顶（现副食加工厂址）。

严博球守备团驻防都城后，治安比较正常，商业亦趋于繁荣。每逢圩期，不仅附近农副产品云集都城，而毗邻